

走向过去:《隐之书》中的叙事欲望

蒋 贤 萍

(西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A.S. 拜雅特的《隐之书》是一部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后现代小说,但小说叙事连贯完整,显示出作者拜雅特想要重新捕捉维多利亚时代之精神的渴望,也显示出她“占有”过去的欲望,而并置的故事情节使得她能够保持其叙事欲望。小说呈现出基本的不确定意识,同时又反复强调我们的获取知识的能力,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张力。拜雅特坚信其叙事能够重新建构过去,也相信作家能够通过连贯一致的叙事讲述历史事件。

[关键词] 拜雅特;《隐之书》; 维多利亚时代; 英美文学; 叙事欲望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6-0113-08

在文学创作生涯中,A.S. 拜雅特钟情于历史的过去,最明显地体现在其“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当中,其中主要故事情节都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在拜雅特创作的所有新维多利亚小说当中,《隐之书》尤其体现了作者“占有”过去的欲望,小说清晰地表现出对历史的构建。许多评论家视其为一部后现代小说,认为这是琳达·哈钦所谓“历史元小说”的典型代表。的确,《隐之书》可谓一场壮观的后现代游戏,展现了现代学术界在理论泥沼之中的苦苦挣扎,以及因过去之不可复得而生的困惑与烦恼。同时,拜雅特为读者创造出连贯完整的叙事,其中所有提出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解决。与那些她(或许)一贯支持的后现代信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拜雅特在《隐之书》中采用了旧式维多利亚小说所遵循的传统写作技巧^{[1]25}。笔者认为,拜雅特的《隐之书》是一部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后现代小说,但小说叙事连贯完整,显示出作者拜雅特想要重新捕捉维多利亚时代之精神的渴望,也显示出她“占有”过去的欲望,而并置的故事情节使得她能够保持其叙事欲望。

一 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之间

拜雅特在《隐之书》中对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艾许的腹语诗给予充分认可,对罗兰和莫德所建构的有关艾许与拉莫特之间的爱情故事,拜雅特也全然

接受,从而显示出创造真实历史叙事的可能性。拜雅特在小说中采用各种“类文本”(paratexts)(如信件、日记、诗歌、神话故事),赋予其叙事以高度的真实性,同时强调文本的媒介性质。这一文本拼贴凸显出小说情节的非连贯性及破碎性,从而使得完整连贯的叙事趋于复杂化。然而,这些类文本在打破故事情节逻辑性的同时,也促成故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

在一篇题为“反对枯燥”(Against Dryness)的文章中,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惋惜于“确凿的真理”(hard idea of truth)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廉价的真诚”(facile idea of sincerity)。世界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地方,文字将我们与之隔离开来,而拜雅特相信这些文字本应拉近这段距离。正如罗兰所说:“语言本质上有所欠缺,永远无法表达出存在的东西,只能表达语言本身。”^{[2]445}因服从于后结构主义精神,我们只有放弃获取“真理”的冲动。拜雅特意识到:“不管起初多么诱人,甚至显然是‘真实’的,但事实或许不过如此: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只是偏颇的虚构,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全盘接受将最终抹去艺术及道德生活中的所有伟大之处。”^[3]这种“伟大之处”的缺失正是《隐之书》的中心主题之一。

《隐之书》的核心主题是探讨过去与现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拜雅特将文学与理论并置,而对

[收稿日期] 2016-10-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空间想象与女性主体的建构”资助(项目编号:15XJA752002)

[作者简介] 蒋贤萍(1972-),女,江苏宜兴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后者显然是摒弃的态度。她在小说中这样写道,罗兰“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由叙述理论主导的时代。”^{[2]121}作者在小说中描绘了一群对过去持有不同态度的学者;文学史俨然成为知识的宝库,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文学史,就会获得巨大的力量。有些学者只想利用过去获得他们希望获得的东西,另一些学者则试图与过去建立一种适当的关系。拜雅特对后者给予充分的褒扬。在莫德和罗兰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从狭隘的自我型学者逐渐蜕变为富有情感的个体,并通过直觉及诗性智慧认识过去。然而,像弗格斯·伍尔夫和利奥诺拉·斯特恩这样的研究学者是无法获悉真理的,因为他们只是活在理论的世界里,而且以为解读过去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理论为媒介。他们的内倾性,无论是拉康的心理理论还是女性主义理论,都阻碍了他们对“真实”经验的获取,从而导致对过去的误读。起初,莫德和罗兰两人也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正如罗兰对莫德所说:“我们懂得那么多知识。结果到头来我们所发现的,其实是一种出自本能、能带来共鸣的魔力。形形色色各种幼稚的自以为是。什么事情都扯上了我们自己,结果呢,我们被困在自己的牢笼里”^{[2]249}。莫德也曾对罗兰说:

“我们了如指掌,就像你说的。我们懂得非常多的知识。好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何以自我不会单一地存在——知道自己是怎样由各种矛盾的、互相影响的体系构成的——然后我就想,我们当真相信这一切吗?我们知道欲望是我们的力量,可是当真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又不明所以,不是吗?”^{[2]261-262}

维多利亚时代的两位诗人真诚相爱,他们充满自信而富有激情,并不受元反思的困扰。而像罗兰和莫德这样的现代学者总是受到过度关注自我心理的束缚。这样的意识使得两人都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从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表现在两人都对“干净的空荡荡的床”^{[2]262}的渴望。这种渴望反映了他们想要重新捕捉其祖辈纯真与自信的内心冲动。

罗兰与莫德彼此之间互生情愫,这是两人最初建立真正联系的时刻。拜雅特暗示他们对一张“干净的空荡荡的床”的渴望是“对后弗洛伊德主义泛性论的回应……也是对现代学术界激烈竞争的回应”^{[4]86}。由于共同的认识,罗兰建议莫德暂时放下

枯燥的研究,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只是想看些东西,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因为一层又一层含义。要些新的不同的东西。”^{[2]263}在去往约克郡的途中,罗兰与莫德最终放弃了曾经严格遵循的历史方式,也开始找到与过去之间真正的联系。

新的不同的东西,他们是这么说的。这一天他们十足的尽兴。这一天,有着所有人在童年时期打心底里期待过的蓝蓝的金光闪闪的好天气,也由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短暂记忆,让人觉得这就叫好天气,于是过去的好天气自然就是这个样子,于是以后的好天气也理应这个样子。这可真是个前往新鲜去处的大好日子^{[2]263}。

假如说这不是一种怀旧,那至少也是他们渴望生活在一个古老的世界里,渴望他们知道得不要太多。罗兰和莫德所要做的并不是准确地再现过去(对此拜雅特深信不已),而是试图重新燃起对过去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之价值与信仰的激情。罗兰在小说末尾从文学评论家到诗人的转变,表明拜雅特对当代学术界理论倾向的断然拒绝。这一转变使得罗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诗人艾许,这也是他与历史的过去以及文学的过去发生联系的重要时刻。

小说第26章是以艾许《冥后普罗赛比娜的花园》中的诗节开头的。这首诗描述了语言的诞生、诗歌的诞生以及诗人的诞生:

第一批人类为此地命名,也为全世界命名
他们创造出文字:庭院与树木
毒龙或蛇以及女人、青草与黄金
以及苹果。他们创作名称,创作诗文
命名万物,创造万物^{[2]437-438}。

艾许在诗中描写了一个在语言与真实世界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的时代。但语词并非物,这里的先民很快就开始借助其他文学修辞:“接下来/他们混合名称,创造出暗喻/或是真理,看得见的真理,金苹果”^{[2]438}。我们已经逐渐远离那个最初的地方,但我们倾尽全力想要实现回归。随着人们的不断努力,随着语词的不断积累,那个地方变得更加模糊。语言无法帮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地方,相反,它只会威胁其存在。“那地方就在那里/

是我们命名的地方,也非我们命名的地方。的确是。”^{[2]439}上述诗行也准确地描述了罗兰的困境。他对那些尚未受到批评理论玷污的纯语词再度产生兴趣,并开始重新审视他与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艾许之间的关系。然而同时罗兰能够与艾许保持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他能够摆脱先辈对其思想行为的控制与束缚。

随着摆脱先辈的束缚,罗兰从地下室公寓中走出来,走进充满生命气息的庭院。这标志着他的重生,标志着其转变的最终完成。罗兰的诗情开始复苏,语词自动呈现为诗歌。“今天晚上,他想到文字,从心底某个井口出来的文字,一个又一个词汇表自动排列成诗。”^{[2]446}罗兰第一次意识到他(而非艾许)的心灵正在进行创作:“他还有时间感受感受之前和之后的奇怪之处;一个小时前,他还写不出诗,现在,诗文如同雨水般落下,真实无比。”^{[2]446}此时罗兰已完全敞开自己、面向世界,而在此之前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罗兰通过他萌生的诗情感受到与艾许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1]36}。同样,在莫得和她自己的过去之间也逐渐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二 拒绝现在与拯救过去

《隐之书》在伦敦图书馆中拉开序幕:罗兰正在这里翻阅书籍,期间发现了两封未写完的情书,出自著名维多利亚诗人艾许之手。这次偶然的发现令他激动不已。书信中所表达的热烈的爱情以及不为人所知的收信人,促使罗兰继续追寻,最终引出另一位女诗人拉莫特。罗兰得到拉莫特研究学者莫德的帮助,两人沿着不同的线索分别进行跟踪研究,最终揭示出艾许与拉莫特之间鲜为人知的秘密爱情。拜雅特渴望重新捕捉维多利亚时代之精神,捕捉其活力与确定。假如不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本身之活力与确定的捕捉的话,那至少也是对她认为已受到威胁的连续性之活力与确定的捕捉。一种“拯救”文学先辈的使命感贯穿于拜雅特的文学评论及文学创作当中。拜雅特对当下持有批判的态度,她构建了一个超越于现在之上的过去,还将两个相隔遥远的时代进行并置,指出我们对先辈的认识是不充分的。回归过去就需要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之哲学,而付出的代价就是抛弃后结构主义。达纳·希勒(Dana Shiller)认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诞生主要是受到重构过去——通过质疑确定的历史知识——之修正主义力量的推动。”^[5]《隐之书》进一步发展了这种

观点,为读者展示了许多错误的回归过去的方式。

同拜雅特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隐之书》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其小说试图呈现故事的两面:情节本身和情节解构。于是,拜雅特的小说总是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致使很多评论家将其归属于后现代作家。的确,拜雅特使用了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写作技巧,如元小说、碎片化、互文性,但同时她对后现代事物保持谨慎的态度,因此,迈克尔·利文森(Michael Levenson)称她是“后现代维多利亚人”(postmodern Victorian)。在她的很多作品中,尤其是在《隐之书》中,拜雅特显示出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否认意义的焦虑^{[1]20}。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书中人物都被各种欲望所驱使,其中大部分都与知识的获取有关。拜雅特这样写道:

一开始,罗兰是以全然专注的好奇在阅读,一如阅读鲁道夫·艾许的作品。这种好奇是一种带着预言的深入,他深知另一个人的心思如何推展,他读过的东西都是他早已读过的,他掌控着他特有的、惯性的构句与着重点。他的心可以向前跃进,聆听尚未读到的部分的律动,好似他就是作者,在脑中聆听着这些还未写出来的文字的魂魄的律动^{[2]121}。

在小说叙事中,拜雅特强调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与现代研究学者之间其欲望的不平衡。前者毫无疑问是出于“必要”而渴望彼此,而现代研究学者仅仅是渴望了解过去的人物,只是替代性地重新经历先辈的生活。最终使得莫德和罗兰能够发现艾许和拉莫特之间的爱情故事,除了学术兴趣之外,还有他们认为可以借此而进一步认识自我。

在拜雅特笔下,维多利亚时代似乎比现代更加稳定、更加牢固,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与情感,而不受后现代怀疑论思想的困扰。然而,后现代批评家对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的批评主要是借助“割裂”的方式,仿佛所研究的客体完全脱离我们而存在,从而抹杀我们与研究客体之间存在的许多共同之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类文本相互作用,创造出一个比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和谐、更完整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诗人钟情于那些贴近作家心灵的东西。拜雅特在其“浪漫传奇”中创造了一个时代,其中可以通过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an Greenblatt)所谓“社会能量之循环”(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而获得某种稳定性,而这些“社会能量之循环”在拜雅特小说的互文性中得以具体体现。因此,我们看到《隐之书》中的现代学者显然处于美学劣势当中。维多利亚时代诗人通过语言能够表达真实的情感,而研究他们的现代学者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拜雅特的小说不仅是要拯救过去,而且还要赋予过去那个时代一种优先权。或许这并非一种怀旧,而是渴望保持或重新确立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在《隐之书》中,与现代学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非常确信他们是真正的人,他们不受现代理论(即认为不存在具体的人格,每个人都是某种时间碎片与语言碎片的混合物)的束缚,他们相信自身的重要性,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在上帝眼中还是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4]82-83}

小说开篇不久我们便发现,现代研究学者的确被他们所发现的文献完全“占有”。罗兰和莫德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来阅读艾许和拉莫特的书信,并苦苦思索其中的涵义。书中写道:“一整天下来,莫德觉得克里斯塔贝尔实在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为了对付这种压迫感,她不断让自己更加系统化。用大头钉、分门别类、打探了解。”^{[2]126-127}拜雅特并未明确告诉我们莫德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与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相比较,现代学者感到相形见绌,但这同时也促使他们与先辈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与过去之间不安的关系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一种动力,使得他们愈益接近其研究对象。起初只是一种客观冷静的学术研究,最终转变为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莫德驶离贝利家的途中,她默默地想象着克里斯塔贝尔驾车行驶在同一条路上的情形。她陷入沉思,并且逐渐感到现实世界的虚幻性:“这一大片厚实的树林,她这辆嗡嗡叫个不停的铁壳车,她一心想窥探克里斯塔贝尔走过的人生的好奇心,忽然间全都像鬼魅一样,轻飘飘地啃蚀着、煎熬着来自过往的青春活力。”^{[2]127}此时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感到无所依凭的并非逝者克里斯塔贝尔,而是生者莫德。

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今时代的并置表明,现代学者所关注的事物与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所关注的事物并无大的差异。拜雅特在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今时代之间建立起一系列相似之处,小说文本传递出某种历史循环的意蕴,尤其表现在现代学者罗兰、莫德与

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艾许、拉莫特相似的行为及个性方面。小说文本中不同时代人物的相互指涉进一步模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罗兰和莫德彼此互生情愫,艾许和拉莫特之间的爱情,这两个情节之间存在最为紧密的联系。两位现代学者对其研究客体生发的同情,最终使他们完全放弃后现代研究视角,接受一种更人文的探索过去的方式。显然,这两对恋人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最终使得罗兰和莫德在重构过去的尝试中完成了想象性的跨越。罗兰心想,“他和莫德受到命运的驱使,至少有这种可能性,而这命运并不是他们的,而是别人的。”^{[2]401}可以说这两对恋人事实上都受到同一情节的驱使,而这一情节反复出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未间断。

在拜雅特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不受后人人文主义思想的束缚,他们过着充实而真实的生活。拜雅特所为即福柯所说的“抚慰人心的认知游戏”^[6]。她试图创造某种连续性,力求找到人性中恒久不变的品质,因此,她笔下的现代学者能够与其研究客体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产生紧密的联系。显然,拜雅特坚决否认世界已经发生改变,否认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不论多么崇高或意义非凡——将永远不会得到复兴。

三 情节编排与叙事欲望

在《情节阅读》(Reading for the Plot)一书中,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探讨叙事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其“叙事欲望”的概念有助于解释我们赋予混乱的历史以某种形式从而使其恢复秩序的心理诉求。“情节”不仅能够满足我们赋予事物以意义的需要,而且有助于减缓各种焦虑。布鲁克斯指出,推动写作与阅读的是同一种力量,因为两者都致力于对意义的追寻。它们暗含某种朝向意义的进程,正是其结构功能预设了将经验秩序化的可能性,使其成为可以理解、可以认知的形式。情节的这种构型品质,能够赋予本无意义的事物以意义,因此,叙事是求知欲望的产物,也是终止求知欲望的尝试^{[1]6}。

对历史小说的阅读进一步反映了我们对意义与目的的追求。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说,作家有一种“对意义的激情和意义的激情”(passion for and of meaning),文本通过截然不同的冲动构建这种激情,并决定其不同的叙事方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史学家采用的是情节编排

(*emplotment*) 模式(浪漫传奇、喜剧、悲剧、讽刺剧)。换句话说,对于情节结构的选择揭示出史学家本人与历史的关系,也揭示出史学家以其特殊方式描述过去的冲动。这同样适用于对历史与过去具有浓厚兴趣的文学家。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小说家是特殊史学家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怀特关于情节编排的观点用于小说研究。对于情节的选择不仅反映出作家对历史的态度,而且反映出作家想要讲述的关于过去的一切。

在《崇高的欲望》(*Sublime Desire*)(2001)一书中,埃利亚斯(Amy Elias)指出,元历史浪漫主义者(*metahistorical romancer*)所追求的知识即为“历史的崇高”(historical sublime)。她将“元历史意识”(meta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等同为“后创伤意识”(post-traumatic consciousness),因为它试图揭示的叙事关乎混乱不堪、令人不安的过去^{[1]13}。埃利亚斯认为,叙事是表达个人摆脱创伤之欲望的途径;或是将其融入当下历史之中,或是全然否定其力量。我们尚未获得满足的欲望清晰地表现在我们的叙事当中,我们构建叙事意在捕捉无法再现的、缺席的过去。

拜雅特承认,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不如先辈那般充满生机与活力,某些东西早已消逝殆尽,但她试图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恢复曾经的生机与活力。拜雅特并非想要回到维多利亚时代,而是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联系。其小说标题揭示出作家“占有”过去的欲望,就像小说中那些现代学者一样。他们为“文字叙述给撩起的好奇心”^{[2]233}所驱使,读者同样分享了这份“好奇”。拜雅特通过叙事与情节编排,试图重新构建一个过去,也呈现一个逐渐消逝的现在。这一呈现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首先是对一致性与终结的强调(回归维多利亚式的情节设计),而且认为我们能够获悉故事全貌;其次,她采用“腹语术”(ventriloquism),从而疏通过去的声音,借此使逝者“复活”,而这种腹语术依赖于对过去的某种移情式“阅读”。拜雅特的小说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再现历史的方式。叙事欲望的研究显示,作者的叙事要么为了满足某种欲望,要么为了缓解某种欲望。布鲁克斯认为,我们的叙事欲望说明我们需要理解一个“破碎”的自我,其中“讲故事成为唯一可行的‘探索’方式”^{[7]54}。

“占有”过去的问题及其可行性是《隐之书》关

注的核心主题。小说标题不仅揭示了现代学者“占有”过去的欲望,而且也表达了作者本人“占有”过去的欲望。布鲁克斯在心理学层面上指出,这种欲望就是构建一种叙事,借此“可以再生产过去,也允许现在的干预”^{[7]234}。可以说欲望作用于叙事,促使事件向前发展;叙事同样也作用于欲望,缓解欲望或使之可以承受。因此,当拜雅特对其笔下现代主人公所处的理论窘境表示不屑时,她自己也受到相同欲望的困扰。《隐之书》并置的情节结构能够使作者保持叙事欲望。尽管我们永远都不会洞观“一切”,但我们总有可能获悉“更多”。

起初,罗兰偶然发现了艾许在维柯著作《新科学》中所作的旁注;后来,他又发现了艾许写给一位神秘女人的两封书信。罗兰因此而兴奋不已,因为他发现了久被封存的“纸叶”：“这些没有生命的‘纸叶’又继续窸窣窸窣地飘然飞落。系带的解开,为它们带来了生命。”^{[2]3}至此,罗兰感到他与过去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但拜雅特同时也暗示书信中存在的悖论:罗兰在发现“追求知识的道路绵绵无尽,说来枯燥,却又令人向往。”^{[2]4}罗兰和莫德的研究有别于其他人的研究,因为他们发现过去是有生命的。罗兰将他发现的书信悄悄带出图书馆,他对莫德说它们还“活着”。对穆尔特默·克拉波尔教授来说过去是僵死的,而对罗兰和莫德来说它们依然鲜活,这使得他们能够发现神秘的过去。然而,在此之前,罗兰和莫德必须克服来自个人和外部的阻碍。起初,他们或许只是“理论上知道”,却没有真正“感受”,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自己作为批评家的身份,这种身份被赋予太多的学术色彩,使得他们以一种嘲讽或俯视的态度审视过去,从而阻碍了他们与研究客体之间的移情互动,而移情互动在任何历史传记建构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来没有哪个地方——或是什么事情——会让我这么感兴趣——那可以让我联想到一些事情——”

“我也一样。我的研究主要是在分析文本方面。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对于别人私生活的态度我真的不能苟同。”

“如果说一定要这么巨细靡遗地分析才行”,罗兰说道:“难道就非得这么做才成?”

“那你就不要涉入个人隐私,去作精神分析——”莫德说道。罗兰没有反驳。当初建议到里

奇蒙来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的人是他,而现在,他们也真的来到这儿,望着那座令人困惑的小屋子。〔2〕²⁰⁷

拜雅特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罗兰为何感到“困惑”,但她暗示,对那些喜欢借助文献建构过去的研究学者来说,狭窄的房间过于真实而缺乏足够的文本性。罗兰和莫德发现他们已无法保持自己的想象力,因为他们逐渐倾向于探求其通过文本线索建构的叙事。他们试图站在研究客体的立场上重新审视,正如罗兰所说:“那真得要用心地想象,才能想得出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2〕²⁴⁹他们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共鸣不断增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情感结构最终使得他们不得不承认对彼此的爱情。罗兰与莫德在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文本的过程中,其学术兴趣开始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莫德向罗兰建议说应该告诉其他人并“一起商量对策”〔2〕²³²时,罗兰问她那是不是她真正想要的,莫德回答说:

“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我也希望发现的人是我。想当初你带着那封偷来的信到林肯郡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发疯了。可现在,我深有同感。那种欲望真的不是为了事业什么的,倒是一种源自本我的感觉。”

“让文字叙述给撩起的好奇心。”〔2〕²³³

现代学者受制于某种欲望的驱使,不论是罗兰还是莫德,他们都沉迷于对知识的“探求”,都迫切需要将故事连接起来,构建一种合理的情节。罗兰称其为“为文字叙述给撩起的好奇心”,但这不仅仅是一种“好奇”,而是渴望获取知识的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也可以说是拜雅特自己)试图用语言来准确描述其经历。叙事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对叙事的建构意味着占有。莫德希望做出这一发现的是她自己,因为这样她就会“占有”知识。如此说来,对叙事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理解我们自身欲望的欲望,是赋予我们欲望以意义的一种方式。针对我们想要理解事物的渴望,情节常常暗含一种承诺:只要具备足够的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理解我们的欲望,而且可以控制我们的欲望。

四 一致性与终结

拜雅特沐浴在令人慰藉的叙事之中,因为通过

叙事可以摆脱时间与存在的混乱状态。罗兰指出:“一致性与终结,这两种人类深层的欲望,目前已经不流行了。但二者总是那样令人恐惧,却又令人神往。”〔2〕⁴⁰¹拜雅特认为任何对一致性叙事的蔑视都是虚伪的,因为没有人不渴望秩序与完整。除了诸多文本关联之外,拜雅特还通过其叙事方式创造出文本的一致性。有时她借助全知全能的叙述,以此避开当下流行的叙事方法。这样,她就可以为读者提供现代学者无法获知的信息,或许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获知。显然,全知全能的叙述为读者提供的细节与事实在现存文献中从未被记录。她采用全知全能叙述的目的就是“说出我小说中的史学家和传记家从未发现的事实,从而提高读者进入文本世界的想象力”〔8〕。

拜雅特深深知道,我们生命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未曾表达的,总有一些思想是未曾说出的,也总有一些情感是未曾转换成语言的。所有这些“未曾”最终导致历史的片面性。因此,阅读《隐之书》是一次充满悖论的体验。我们的理性知道不可能完整地记录历史,小说却让我们感到,通过事实、虚构及历史的想象,可以获悉历史的全部。通过这样的策略,究竟是谁的欲望获得满足?或许是拜雅特满足了她自己的欲望,或许是她满足了读者的叙事欲望,因为她知道读者不愿看到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她在小说中用必要的细节来弥补我们的想象,从而建构一致的叙事,或许她也是为了避免我们对其文本的阅读会像她笔下的现代学者那样主观或片面。

在小说第25章,拜雅特再次回归全知全能的叙述,但此次回归很可能躲过读者的视线,因为本章以爱伦的一篇日记开头,接着是克拉波尔传记中的节选,紧接着又是一篇日记,同样的字体,日期是1889年11月27日。这些文字描写爱伦准备埋葬丈夫时内心的所思所想。这一手法隐晦而巧妙,因为日期的录入很容易让读者相信这些文字都是客观的一手的资料。作为读者,我们再次获知现代学者无法获知的信息。我们从中了解到爱伦其实早已知道丈夫与拉莫特之间的关系,而且布兰奇曾经两次拜访爱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章为读者揭露了许多爱伦本想隐藏的事实。她在日记中写道:“(艾许)经常对我说,将我们认为具有生命的东西都烧掉,这些东西具有我们回忆的生命,别让他人拿去当作珍品,或是拿去编织谎言。”〔2〕⁴¹⁸然而,爱伦此时在日记中的信息选择,须引起我们的警觉,因为“她渴望

不要被告知,不想听见他(艾许)的话”^{[2]427}。这篇后记读来像是某种附加物,因为拜雅特早已借助从艾许墓穴中“盗”来的“秘密”结束了她的故事。现代学者知道艾许和拉莫特的女儿依然在世,莫德是其直系后裔,这是真实的;他们也知道艾许从未见过自己的女儿,而怀表中的那绺头发是克里斯塔贝尔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些事情发生了,却没有留下可以觉察到的痕迹。这些事情没有人说出口,也没有人提笔写下,如果说接下来的事件都与这些事情无关,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说法可就大错特错了。

有一个炎热的五月天,两个人的相遇,之后从来没有被提起^{[2]474}。

拜雅特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质疑我们了解过去的能力,然而,这篇后记却恰恰肯定了我们了解过去的能力。不论拜雅特在小说中创造出多少不确定性因素,但她仍然使读者相信过去的一切都能够被获悉。就像传统的史学家一样,拜雅特最终希望从文本中隐身。通过全知全能的叙事,她似乎创造一个透明的过去,只等我们去发现并记载。显然,作者从文本中隐身,也从讲述故事的现在隐身,从而制造出一种假象:读者可以不通过任何媒介直接回归过去。于是,我们与过去之间的关系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作者,她只是作为媒介将过去传递给我们。不管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后记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强烈的叙事欲望而烟消云散。

小说结尾描写了艾许与女儿玫会面的情景,事情发生在1868年5月的一天,却从未载入史册。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一次温馨而甜蜜的邂逅。在与女儿短暂交谈的过程中,艾许发现克里斯塔贝尔为了避免谣言,一直假称是玫的姨妈,并生活在孩子身边。艾许请玫给姨妈带个口信,玫答应了他的请求,拜雅特这样写道:“她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哥哥,一起胡闹打滚,可爱的后冠因此损坏,她也忘记了口信,永远。”^{[2]476}凯瑟琳·凯利(Kathleen Kelly)指出,未送达的口信“代表了人类关系中所有美好的‘假如’和‘希望’。此外,也更为关键的是,未送达的口信代表了作者所处的窘境:最终难以开口说出原本希望说出的话。”^[9]这一发现表明,拜雅特并非真正处于叙事窘境,对于需要说出的一切,她并未表现出任何表达困难。

在小说结尾处全知全能的叙事中,拜雅特再次显示出其欲望所在:为读者奉上一部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后现代小说。尽管拜雅特在文本中制造出种种不确定性,但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传统的结局,试图达到完全的可读性。同时,拜雅特的小说强调重读历史的可能性。《隐之书》的结局创造了一种完整性,读者能够从中获悉全部的过去。正如布鲁克斯所说:“如果说叙事的动力来源于欲望、总结、建构越来越大的意义单元,那么意义的终极决定因素在于终点,叙事最终地、也无情地是对终点的欲望。”^{[7]52}我们需要终点以消除所有感到的不确定性因素,消除隐藏在情节褶皱中的所有疑虑。文本结尾勾勒出事物的真实轮廓,使得我们能够对其划分归类,并感到自己的确获悉了事情的真相。此时,我们得以与过去发生互动,并且保持对过去的绝对权威。叙事欲望部分来自于与过去达成妥协、容纳过去,并且将其归属于某个地方,使它不再拥有影响现在或未来的力量。

《隐之书》是一部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后现代小说,其中援用了诸多矛盾性因素。正如我们所见,其文本似乎是对历史的一种批判。拜雅特坚信叙事能够重新建构过去,也相信作者能够将历史事件编织进一致性叙事当中。她在历史话语和小说话语之间来回穿梭,通过小说揭示出历史是如何被创造又如何被再创造的。然而,她依然相信拥有一定感知能力和同情能力的诗性灵魂能够解读涂鸦文字,从而真正了解过去。拜雅特相信,历史能够被叙事化,过去可以被赋予适当的情节,从而使它对当下产生意义。用戈蒂尔(Tim S. Gauthier)的话说,拜雅特是“被真实所诱惑”^{[1]81}。戈蒂尔指出当代作家备受历史嫉妒的痛苦,因为他们认为历史能够反映现实。可以说促使作者书写的,除了焦虑及叙事欲望之外,就是他们一直相信,文学是了解过去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在拜雅特的叙事中,所有的矛盾最终都得以解决。尽管她试图构建某种幻想的产物,但她所透露的信息十分清晰:只要知道如何解读过去,我们就能够获悉过去的全部。

[参考文献]

- [1] Tim S. Gauthier. Narrative Desire and Historical Repar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 [2] [英]A.S. 拜雅特.隐之书[M].于冬梅,宋瑛堂,译.海

- 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 [3] A S Byatt. *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17.
- [4] A S Byatt. Interview[M]. *Writers and Company*. Ed. Eleanor Wachtel.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94.
- [5] Dana Shiller. 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M]. *Studies in the Novel* 29.4 (1997):541.
- [6]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M].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88.
- [7] 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 [8] A S Byatt. *On History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56.
- [9] A S Byatt. Kathleen Coyne Kelly[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98.

Approaching the Past: Narrative Desire in Byatt's *Possession*

JIANG Xian-pi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 *Possession*, A.S. Byatt exhibits the desire to give us a postmodern novel in Victorian setting. The author creates a coherent narrative in *Possession*, demonstrating a yearning to recapture what she perceives as the vitality and contingent assuredness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In the ordering of her own narratives, Byatt reveals her need to control the past. The juxtaposed plots allow for the maintenance of her narrative desire. Besides, the novel plays constantly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an awareness of the basic uncertainty and a continued assertion that one can know. Byatt displays the greatest degree of confidence in narrative's capacity to reassemble the past, and demonstrates faith in the writer's ability to employ historical events in a coherent narrative.

Key words: A.S. Byatt; *Possession*; Victorian age; narrative desire